

中美两国教育制度 的比较研究

孙宏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序

最近西北大学外语系孙宏博士完成了专著《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这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其中有些已用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报刊，现在汇集成书，他又做了精心的修改补充。

1987年孙宏到美国去读教育学，当时我正在西北大学主持校政。说实在的，外语系的教学任务很重，像孙宏这样的年轻教师并不多，而一些有经验的老年教师又即将退休，所以我内心不希望他外出，但是又想到他获得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颇不容易，最终还是同意他外出读学位。在他临行时我叮嘱：“学毕就早些回来，西大需要你。”他的回答很干脆：“一定回来。”

大约过了两年，孙宏的妻子（工人）患病住院，通知了在美国的孙宏，他很快就回到西安探视妻子的病情。在间隙中他来看我，这个时候，我感到他是一位非常可信的人，非常重情义的人。他再次向我保证，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西大工作。我从心底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完全相信。你这样关心生病的妻子，做得对啊。”他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朴素和善良的工人，在她生病之初即将进医院之前曾来看我，征求是否要孙宏返国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应立即将病情告诉孙宏，要他快点回来。

当他的妻子出院后，孙宏便又匆匆飞返美国，继续他的学业。大约又过了两年多，孙宏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取得教育科学、哲学博士，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西北大学外语系。这时我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学校的行政负责工作，但我仍然热烈欢迎他回来。“说话算数”，在我心里说出了这样的话。

孙宏朴素而忠厚的心地和性格，读者朋友从我上面的叙述中

可以看得清楚。

他回国后即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的紧张劳动中，尽管有些事并不如人意，但他自己主动地加以协调，例如，他讲授英语，这和他的专业教育学并不完全谐和，这个矛盾一时解决不了，他便白天教书，晚上从事教育学研究。我想，这毕竟是暂时的事，将来孙宏会有充分时间从事教育学的研究的。

孙宏研究的课题——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进行这项研究，从历史到当今，随着两国教育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整体的比较，这就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两国教育制度之异同，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教育制度如何吸收美国教育制度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发生浓厚的研究兴趣。这正如孙宏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说：“中国不仅在目前综合国力以及教育水平都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情况下，要对外开放，即使将来居于世界前列时，仍要谦虚谨慎，随时注意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教育制度的经验和长处。”我想，孙宏的这本著作的价值正在这里。

当孙宏和他的妻子将稿本给我，要我作序时，我向他们表示：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教育学的，但是我愿意作为孙宏著作的最初的一批读者之一。对于心理素朴而又有着强烈事业心的年轻学者，我们应当给以支持和关心。

张岂之

1993年6月11日晨于雨声中

目 录

序

第一篇 总论	(1)
第一章 概述	(3)
第二章 研究的范围、意义和方法	(8)
第二篇 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纵向考察	(12)
第三章 中美两国教育管理结构的演化	(13)
第一节 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	(13)
第二节 美国的教育管理体制	(24)
第四章 中美两国教育普及的演化	(38)
第一节 中国的教育普及	(38)
第二节 美国的教育普及	(58)
第五章 中美两国教育财政的演化	(78)
第一节 中国的教育财政	(78)
第二节 美国的教育财政	(78)
第三篇 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横向考察	(93)
第六章 中美两国教育管理结构的并列和比较	(94)
第七章 中美两国教育普及的并列和比较	(106)
第八章 中美两国教育财政的并列和比较	(125)
第四篇 结论与展望	(133)
第九章 结论	(134)
第十章 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展望	(136)

主要参考书目.....	(140)
后记.....	(159)

第一篇 总论

自从“文化革命”结束和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本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这场改革的核心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虽然教育并未列入四个现代化之内，但这绝不意味着教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因为它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势必从各个角度对这一全面现代化的计划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事实上实现每一项现代化都必须以先进的教育作为前提和后盾。没有现代教育为工业和农业部门培养富于才干的管理人员，为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科学家和技师，为陆、海、空军训练能够在现代化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指挥员和战士，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便无异于纸上谈兵。国务委员、前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 1990 年 3 月举行的世界公立教育大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时就曾强调教育的这一战略作用。他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年来我国发展教育的努力时得出五项结论，其中第一条就是在整个国民发展中，要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上。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的教育

事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必须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①。

^① 刘爱橙：《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的战略位置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3月7日，第4版。

第一章 概述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注意到教育是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他曾提出“庶、富、教”的理论，强调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但教育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一个被动消极的产物，而是一个对社会发展产生能动作用的积极因素。美国学者丹尼森曾对美国自 1910 年至 1960 年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进行过认真研究。当他把资本及劳动力数量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对比分析以后，发现经济上产出的增长高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这也就是说，部分经济增长的“余值”不能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来解释。于是丹尼森开始探寻这个“余值”中究竟有多少来自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有多少来自于其他因素。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的 25% 应归于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他又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一些国家 1950 年至 1967 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结果是英国为 12%，比利时为 14%，加拿大为 25%。从丹尼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即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解释许多国家相当部分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最近对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泰国等的研究也表明教育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 12 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在 83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这表明，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具备较好的人力资源。对经济与教育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教育提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即增强了劳动力的文化、专业知识以及能力，因而

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其由穷变富。其次，这些国家和地区致富以后有了更多的财力办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从而使它们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①。无数研究表明，凡是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即使自然资源贫乏，仍能克服重重困难而实现经济高度的发展。然而，凡是教育落后的国家，即使自然资源丰富，也仍然不可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水平。因此，教育作为与一个社会中人的素质直接有关的一项长期投资，不仅反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前改革中其它各个方面的发展。

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贝雷迪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时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教育是反映一个民族面貌的镜子”^②。伯勒卜进一步指出，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展所产生的重要结果，而且“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达的一项决定性因素”^③。

由于改革与开放这二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在新形势下，对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和改进如果脱离开对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的相应学习和借鉴，则无异于闭门造车，难以奏效。

实际上在过去十余年中间已经有 9 万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到 1991 年为止，其中的 5 万多已回国工作。如何使用这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学者以及如何看待他们的贡献已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外教育家一致认为这些学者的才智、能力和成就以及他们对当前世界上一些知识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些留学归国人员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潜在影响则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中有 5 万余人到美国学习，这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赴国外留学生总数

① 国家计划社会发展局编：《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第 296 页。

② 乔治·贝雷迪《教育中的比较方法》，第 5 页。

③ 珀西·伯勒卜：《在变化的环境中为教育筹资》，第 5 页。

的 60% 左右。自中美两国 1979 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赴美留学的人数则比自 1860 至 1950 的近百年间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3 万人）还要多（《中国年鉴》，1992 年，第 285 页）。

美国教育制度通过这一大批留学生将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同时，美国的教育制度无论就其学术潜力还是其管理水平而言，都居于世界前列。因此，在目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中外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如果离开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探讨则是不完全、不充分的。

另外，虽然中国学者出国留学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要使中国自己的教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做法是使其成为新世界相应的一部分而不是重复旧的传统（例如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的仪式性口号和死记硬背的方式）。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应该使用对教育的一种仪式性定义来代替另一种定义，而要能够“超越这种仪式性的定义，而掌握理性的定义，以便使批评性的探讨在教育方面占据主导地位”^①。

中国的教育制度需要从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中吸收的主要是这种批评性的探索而不是西方教育所具有的一些孤立的、具体的技术性细节。有着持久价值的是捕鱼的艺术而不在于捕捞几公斤乃至几十吨鱼；能够迈出门到集市上买鱼，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掌握捕鱼的方法才能使人终生受益。贺拉斯·曼在 1848 年讲过的一段话对此分析得十分透彻：“政治经济领域所有艺术中最伟大的艺术就是把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第二伟大的就是增加生产力——而达到这一目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增加他们的智力”^②。

周恩来曾叮嘱国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研究中美两

① 伊昂·W·马博特：《现代中国：崭新的幻境》，第 224 页。

② 凯恩·亚历山大：《美国公立学校法律》，第 30 页。

种教育制度时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两种制度各自有其历史这一事实。只有把一种教育制度置于其历史环境中才能对它有一个正确如实的了解，并进而找出这种制度中有些什么基本成分以及其与另一种制度的不同。

在目前的改革中，中国的教育摆脱了几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而正视一个现代的世界，对于中国应该从比较发达的美国教育制度中吸取某些成分，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应该警惕的是这种学习不应该重复在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张旗鼓“学苏联”时那种机械照搬的做法。在那场运动中中国僵滞生硬地套用苏联的方式，如当时曾模仿苏联鼓励生育的做法，奖励多生育孩子的妇女，并授予她们“英雄母亲”的荣誉称号；教育制度的某些方面也照样照搬了苏联的许多做法，按照当时的安排，中国学生在参加口试时要坐在铺着台布的桌子前，在桌上照例放着一瓶花，据说这样可使他们不致紧张，“因为俄国人都是这样做的嘛”^①。

由于这样大规模地“学苏联”，中国的教育制度在结构和形式上不免带上许多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过去十余年的改革中，又出现了新的“学美国”的趋势。中国教育家同意国外同行提出的一些建议，例如放弃前苏联的学术划分方式以及促进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等。但是国外教育家认为，根据他们对中国教育的观察，中国在教育制度上的变化仍然过于缓慢。之所以这样正是由于本世界 50 年代“学苏联”时中国教育部门吸收的一些成分已经根深蒂固，如果对它们加以改变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教育机构作为自立的社会主义部门这种形式提出挑战^②。

① 苏珊·佩珀：《关于中国大学的研究报告：社会主义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实验》，《现代中国》，1982 年第 8 期，第 197 页。

② 苏珊·佩珀：《关于中国大学的研究报告：社会主义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实验》，《现代中国》，1982 年第 8 期，第 196～199 页。

在中国目前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回忆一下当年“学苏联”的经验是大有裨益的，正如桑塔亚那指出的：“当人类不能保存自己的经验时，他就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野蛮人就是这样。忘记过去的人所受的惩罚就是重复过去。”^① 中国目前致力于改革开放，向其它国家学习，但是中国的教育家不应忘记贝雷迪的忠告：“在把一国的做法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时必须格外慎重。”埃兹拉·庞德要我们“领略种子而不是枝叶”^②；在研究一种教育制度时，了解其枝节毫末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制度背后的哲学更不容忽视，因为它是萌生枝叶的种子。

① 乔治·桑塔亚：《理性的生活》，第82页。

② 爱德·福尔瑟姆：《W·S·默文论埃兹拉·庞德》，第70页。

第二章 研究的范围、意义和方法

中美两国的教育制度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当中的两个，所涉及的领域甚广。但是如果对这两种教育制度作一番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有三个因素极为重要。本书就以这三个因素为基础对中美两国的教育制度进行研究，探索这两种制度中的哪些方面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促进或妨碍作用。这三个因素就是：

第一，一种教育制度的管理结构是基本的因素，因为它能够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为了达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对促进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变革。

第二，争取教育普及，使国民在接受教育方面有比较平等的机会，这也是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决定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社会平等发挥促进作用。在《联合国宣言》所列举的各项人权当中，教育占据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当前，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日益重视的一项任务^①。

第三，财政拨款是教育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教育离开财政支持就无法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要改革和发展教育，就必须在教育财政方面努力创造一种公平的，合理的体制。如果承认全体人民在接受教育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在教育拨款方面又保持着巨大的悬殊，那么这种平等是难以兑现的。

对两种教育制度进行比较可以揭示这两种制度各自缺少哪些

^① 布赖恩·霍尔姆斯：《一个比较教育学家关于中国教育的观点》，第8页。

有益的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的作用。因此比较研究不仅是一种进行阐释的技术性工具,而且能够在许多方面显示一个民族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雷尔才作出明确的论断:“没有比较研究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理论。”^①。

本书正试图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在管理结构,教育普及以及教育财政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由于这项研究涉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制度当中的两个,如果对上述诸方面进行随意的考察就会使问题纷繁复杂,缺乏头绪。因此本书采用乔治·贝雷迪提出的系统比较模式。

贝雷迪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对康德尔等人的历史学方法,主张把这种方法加以发展,以利于真正的比较分析。他提出的系统比较方式综合运用了历史和当代各种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方法,代表了比较教育从宏观的历史研究向微观的应用研究的转化。贝雷迪的比较教育研究方式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种研究方法有四个步骤,包括:

1. 描述:即通过阅读资料以及直接观察,广泛而系统地收集有关各国教育情况的材料,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进行描述。

2. 阐释:即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有关学科的角度对已经描述过的各种材料进行分析,以便不仅了解这些国家的教育是怎样的,而且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3. 并列:即对所比较的国家的材料同时进行考察,把有关材料按可以比较的形式排列起来,以确定在什么样的框架内进行比较;然后进一步分析资料,提出假设。

^① 雷约·雷沃拉:《什么是比较?关于方法与哲理的思索》,第263~264页。

4. 比较：即对第三个步骤所列材料进行有选择的全面比较分析，验证假设，并作出结论。

贝雷迪认为这四个步骤代表着比较教育研究中总的趋势。贝雷迪在《教育中的比较方法》一书中还对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这二者的区别做了明确的论述。关于一国教育的报告，不管它是纯粹描写性的还是阐释分析性的，都无疑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但是如果仅仅把区域研究的方法简单地进行重复，这样虽然涉及一个以上的国家，也仍然基本上是一种区域研究^①。因此，雷西纳德·爱德华认为贝雷迪的四个步骤中前两个是研究的基础和准备阶段，后两个是真正的比较过程^②。在这里，描述和阐释这两个步骤实际上构成了对教育的区域研究，而区域研究则是比较研究的准备阶段。真正的比较研究则是从并列开始的；这一步骤代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有关材料的初步对照，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 *tertium comparationis*^③，它是“进行正当比较所依据的标准。”这种标准一经确立，就可以进一步完成比较的最后阶段，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教育同时进行分析。贝雷迪指出，这种比较研究是一个整理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是把有关教育的材料列举出来，而是把已经处理过的材料当中的重点突出出来”^④。

本书是在两个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层次上运用上述的系统方法来进行这项研究的：

第一，本书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演进，尤其是它们在其管理结构、教育普及以及教育财政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进行纵向考察。

第二，本书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在管理结构、教育普及以及教育财政等方面的现状进行横向的考察。

① 乔治·贝雷迪：《教育中的比较方法》，第27～28页。

② 雷西纳德·爱德华：《比较的范围和比较教育》，第241页。

③ 拉丁文，进行比较的中间物。

④ 乔治·贝雷迪：《教育中的比较方法》，第2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第一个层次的考察实际上既是第二个层次考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其准备阶段，因为上述几个方面的演化以及每一种教育制度在这几方面的价值观念对它们的现状有着很大的影响。本书第二篇进行纵向考察，它包括贝雷迪比较方法的前两个步骤，即描述和阐释。第三篇进行横向考察，它包括贝雷迪的研究方法的后两个步骤，即并列和比较。

本书旨在通过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在管理结构、国民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拨款等方面的演变进行纵向考察以及对它们在这三方面的现状进行横向考察，探究两者的差异，对一种教育制度中的某些成分是否有益于另一种教育制度的发展作出结论并对这些可资借鉴之处的利用提出建议。

第二篇 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纵向考察

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中国教育机构从美国教育中吸收和借鉴某些成分（或反之）的最初步骤和必要准备。早在1900年，一位英国教育家就曾洞悉到对其它国家教育的学习不能脱离各自的国情。当时这种借用别国做法的现象在中国方兴未艾，但这位教育家却认为：我们不能在世界各国教育制度当中随意徜徉，就像小孩在花园里漫步嬉戏一样，从一丛灌木上摘取一朵鲜花，又从另一丛树木上拔下几片绿叶，然后就一心指望只要我们把它们带回家里，插进土中，就会拥有一株活生生的植物。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曾经历了无数已被人遗忘的斗争和困难，是“那些很久以前打过的战役”的结果。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生命活动的某些秘密^①。

本书在这一部分里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所进行的纵向考察正是对那“无数已被人遗忘的斗争和困难”进行描述，对“那些很久以前打过的战役”加以阐释。

^① 鲁思·海霍：《现代中国教育机构的进化》，第49页。